

D A N G D A I Z H O N G G U O N O N G C U N Y A N J I U

当代
中国农村
研究

黄蓓/著

忏悔

的

故事

——中国农民对
城市的认知

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三)

忏悔的故事——中国农民对城市的认知

黄蓓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农村研究·忏悔的故事/黄茵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207-06213-3

I. 忏… II. 黄… III. 农民—农村—问题研究
IV. I771.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8790 号

责任编辑: 安晓峰 汤克白

封面设计: 于克广

当代中国农村研究 (三)

忏悔的故事——中国农民对城市的认知

黄茵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 net](mailto:hljrmch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5

字 数 600 000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213-3/C·1442

定价: 36.00 元 (全三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题 记

对“忏悔的故事”，我们在这里作三种意义上的理解。

一是质的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包括写作的基本原则：“忏悔的故事”要求研究者如实叙述自己使用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所作的思考，研究的具体情境以及自己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它通常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作者从“上帝”的位置上降了下来。作为一个普通的“人”，通过袒呈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作者有意识地将研究过程神秘化了。

一是质的研究方法所秉承的一种研究态度：“忏悔的故事”的作者虽然力图如实陈述研究过程与事件，但他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或灵感的降临。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在“局外人”的冷静和“局内人”的情感之间跋涉，想办法克服困难与偏见，改善自己的认知。同时，通过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反省，特别是就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他希望说明，研究不仅仅是研究者个人对有关事件的记录，而且是具有一定标准和规范的集体性行为。

一是我在此项研究中所欲图传递的一种情感和结论：研究和写作本身就是权力和身份的反映，研究者往往声称自己的文本具有“科学”的权威，而实际上，作为产生“知识”和权力的工具，它们往往是复制了生活经验中的霸权，且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隐匿其中的阶层与地位的歧视。这种歧视在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的实践关系

中存在,在许多研究者的理论当中同样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城市人——包括研究者——需要向中国农民做一次集体的忏悔。

正是因为以上几个原因,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成为忏悔的故事。

目 录

第一章 需要忏悔——有关中国农民研究综述 / 1

一、问题的提出 / 1

二、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回顾 / 8

三、源自“年鉴学派”与“底层研究”的反省 / 19

第二章 怎样忏悔——我的研究方法和方案 / 28

一、方法讨论 / 28

二、质的研究方法 / 31

三、我的研究 / 35

四、前村和后村 / 53

第三章 前村的隔膜 / 70

一、隔膜 / 73

二、扶贫 / 88

三、打工 / 114

第四章 后村的交融 / 126

一、交融 / 127

二、后村农民的城市认知 / 145

第五章 学生们(未来的农民?) / 165

一、孩子们身后的背景 / 167

二、孩子们身边的世界 / 172

三、孩子们面前的城市 / 179

四、我的认识 / 203

第六章 终结忏悔 / 221

一、“管它干嘛”与“这还用说” / 221

二、农民的城市认知 / 227

三、城乡关系思考 / 232

四、关于我的研究 / 236

附 调查手记择录 / 240

后记 学者的使命 / 283

参考文献 / 289

第一章 需要忏悔

——有关中国农民研究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孟德拉斯说：“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① 当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民是社会的主要成员时，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不会如此醒目地跳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但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构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到，上述庞大队伍的近半人口都生活在中国，中国农民是当今世界上一个最大的落后群体，而农业和农村问题在中国正日益成为具有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意义的关键问题，那么我们便会同意：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理解都远未达到它应有的程度。

罗吉斯曾经分析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② 我们可以循着他的

^① [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 [美]罗吉斯等著，王晓毅等译，《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322页。

思路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首先,农民占据这个国家人口的绝大部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至2001年底,中国尚有8亿左右非城镇居民,即农民占全部人口的62%。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国家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可以脱离其占大部分的人口而取得真实的进步。

第二,中国存在着现实的农业危机。跨进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无数的困惑、焦虑和难题,而最大的世纪难题莫过于中国的农业危机:它不但阻滞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已成为影响今天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而且在可见的将来看不到可以缓解的希望。甚至,中国加入WTO有可能将中国农业危机提前引爆。

一方面,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一直是中国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最基本的国情矛盾。有限的土地无法养活巨量人口,造成中国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到世纪之交,中国已有5亿多农民失业。另一方面,贫穷的农民承受的负担却在日益加重。由于劳力过剩、土地匮乏、技术落后,也由于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的减少,以及国家为保障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而对农产品价格的人为压低,农民种田已完全无利可图,甚至收不抵支,越种越穷。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还要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层层加重其负担,使农民成为中国“最贫穷的纳税人”。这种作为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大量农田被抛荒弃种,加剧了可能发生的农业危机;第二个后果则更严重,它造成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政权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双方的冲突随时可能触发,加剧了可能发生的农村危机。

在“无地可以耕”和“有地不能耕”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只能流往城市谋生,庞大的“民工潮”、“盲流潮”对城市形成巨大冲击。首先,在城市工人下岗严重的情形下,城市无法消化源源不绝涌入的农村民工;其次,农村民工因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而沦为城市边缘人,形成无恒居、无职业、游荡不定、数

量惊人的流氓无产者队伍,是目前中国社会治安恶化、犯罪事件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城乡二元身份制度显然不再适应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更不符合时代的人权标准,但在推行了几十年之后却已成骑虎难下、积重难返的死结。虽然许多人在呼吁取消城乡户籍制度,让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但可以想见,这种户籍制一旦取消,中国各大城市便有可能在一夕之间被潮水般涌来的农民所淹没,以致瘫痪。

第三,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可能给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威胁。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度分别为2 253元和6 280元,后者为前者2.8倍;到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 476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 703元,二者的比例是1:3.1。这个差距在近5年来是持续扩大的,在1996~2000年间,两者平均每年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4.7%和5.37%。^① 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比收入差距则更为悬殊。据国家统计局官员指出:如果把所有东西包括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都折算进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要达到6:1。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

与此同时,虚报农民收入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业已形成的买方市场使农产品价格一跌再跌,各地上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却持续上升。^② 从农民群体内部来看,据对农村的调查数据推断,现在全国80%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这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农村人口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很严重。

^① 汝信等主编,《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② 《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增长的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大多数人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这是不能叫做经济发展的。但遗憾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正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的,在近20年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有的反而下降了。更不幸的是,中国农民的状况恰恰是给上述结论做了一个论据。1985年以来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且与社会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国中、西部,仍有许多农村地区处于集体贫困状态。国家统计局披露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是4.6%,比上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速度回落到4.3%,1999年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只增长了1.8%,预计全年增长速度可能继续低于上年。农民收入增长持续走低,抑制了农村消费增长,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倘若收入差距之大超出社会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多,那么社会中的各种摩擦和问题就会变得更严重,从而影响经济的进程。近年诸多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正在说明这一点。尤其要看到的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分配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公平竞争的原则,正如许多人都承认的,农民在改革进程中实际上承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代价,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

从某种角度讲,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一样,它们都有赖于富者和贫者之间的差距的缩小。总之,中国经济要发展,绝不能忽视农民,更不能抛弃农民。

然而,与改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急切心情相比,我们对农民的了解却如此有限。“尽管从概念上我们很容易区分出农民,但我

们缺乏对农民整体的、科学的、可靠的了解……人们往往认为农民懒惰,无知,反对变迁。对于没有在农民中生活过的人,农民是一个谜。人们经常用逆光来刻画农民。”^①

当然,其实这些忽略与偏见都是有道理的。“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他们对乡村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他们所有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由于受工人阶级的诞生、资本主义企业惊人的效率以及货币构成的惟一手段所迷惑,他们对没有工资、没有企业主、没有货币条件下运转的社会体系失去了兴趣。”^② 孟德拉斯给出的分析应该是正确的,当整个时代和所有的社会都向着充满巨大感召力的新生活变迁时,我们更多的关注一定是投向未来的,投向那些能代表新的精神的事物,而把旧的冷落在一边。但貌似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判断则容易引起质疑,“正是由于农民缺乏对现代生活的移情,因此‘文明’的观察者也同样缺乏对农民的移情。”^③ 这里的问题是,是农民缺乏对现代生活的移情,还是缺乏对现代生活移情的人被留下来做农民了(或者我们把缺乏对现代生活移情的人称作农民)? 还是现代生活并不允许更多的人对它移情?

在分析我们的政策、研究和舆论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时,孙达人的观点更尖锐,也更有启发。他以为,农民是一些中国人面对国家长期积弱的挫折而选择的替罪羊:“在最近的600年中,中国已长期堕落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农民又是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人口中最落后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发展的下降过程给我们大家造成了浓重的心理阴影。谁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一长串鄙薄农民的理由。”^④

① 《乡村社会变迁》,第320页。

② 《农民的终结》,第2页。

③ 《乡村社会变迁》,第320页。

④ 《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在中国的今天,同样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城市本位主义已经渗入当今文化的深层,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1994年名噪一时的政论性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不经意的宣泄中暴露了中国文化中一直潜藏着的这个不可示人的秘密。农民史学家孙达人因此评论到,“最令人惊异莫名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公开宣扬‘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的观点’。这个标本表明,我们对农民的研究,对农民学的研究是怎样的薄弱,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又是多么刻不容缓。”^①

中国农民固然保守、愚昧、素质低下,但这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改造中国农民整体素质的最佳场所便是城市。但在充满歧视和偏见的环境中,农民只可能产生嫉恨和敌意,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城市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们却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方式。然而就是这个看来并不很难的问题,却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法国农业科学院院士、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国立巴黎—克里尼翁农学院教授克拉兹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几乎所有国家的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似乎建立在对事实和经济机制做出错误的判断以及自相矛盾和幻想的基础之上。”^② 罗吉斯因此提出,“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了很多发展规划的失败……每天农民都在使经济学家叹息、政治家流汗、战略家诅咒。他们的预言和计划在全世界各处被农民所打破——莫斯科、华盛顿、北京、新德里……现代的人只能说服而不能强迫,要想说服就必须知道他们原来的价值观,他们是如何看待世界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简言之,必须知道他们的‘认知图式’。”^③

① 《中国农民变迁论》,第196页。

② [法]约瑟夫·克拉兹曼著,李玉平译,《法国农业政策—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幻想》,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③ 《乡村社会变迁》,第320页。

但同时,要改善我们对农民的认知,研究者自己首先要建立一种理智的、科学的态度,其核心是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对待农民的落后。在这种意义上,我以为孙达人的感慨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关于农民的研究:“在我们的史学和国民心理中,‘精英意识’实在是积淀得太久、太浓、太深了。说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向同行们大声呼吁: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是把培植国民,首先是农民的历史主体意识放到最重要的位置。”^①

谈到改善我们对农民的认知,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另一个方向上努力以深化对农民的理解:我们能否通过“农民对城市的认知”来反思我们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科学认识是一种权力,对认识的公开的和正式的表达更是如此。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它们往往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通常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群有机会实践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地位低的人群的认识。在大多数二元关系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一种尊与卑的对比,看到前者更多地扮演认知主体,而后者安于做认知对象,看到前者更多地表达着对后者的认识:“男与女”、“师与生”、“医与患”、“亲与子”、“官与民”、“主流与边缘”、“警察与犯人”,甚至是“嫖客与妓女”、“正常人与精神病患者”,当然也包括“城市与乡村”。“学生是怎么看老师的?”“孩子眼中的父母?”“犯人所知道的警察”——所有类似的题目在我们的认识经验中如果不是信口开河,那么多少还是有些陌生的。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从文化角度来回答“农村是怎么样的”“农民是怎样的”的问题。但我们似乎尚未关心过农民是怎样认识城市的?我们怎样认识他们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政府决策,他们怎样认识我们将会怎样影响我们呢?

然而我们却必须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我们的。首先,我们要

^① 《中国农民变迁论》,第193页。

认识自己,而要能够更准确地认识自己,就必须以“我看人看我”的方式在相互建构中完成,我们必须站在“他者”面前才能真正地认识自我。要完成对中国城市的完整认识,必须有农民的“在场”。其次,我们要认识农民,因为他们确实“在场”,是因为他们沉默但坚强地存在着,才有了中国今天的所有城市和城市人的这样的存在。

二、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回顾

在现代化的经典理论中,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乡村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还是复兴,遗弃还是重建……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这种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有关社会改造和发展的问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启动的,因此,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格外突出。自20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在中国日益凸显,成为知识界和政府一并关注的显要问题。也由此,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一直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

我们大致可以通过下述三个阶段的划分来回顾整个研究历史:

(一)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不仅没能有效地遏制农村的衰败、克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长期以来累积在乡村社会中的各种矛盾,酿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由此在三四十年代

形成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推动这一阶段的农民研究走向高潮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实践途径,其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是试图从学术上研究并为最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有益思路的理论途径,其以费孝通为代表。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

现代化造成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在20世纪初引起了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意识到,西方模式不能够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办洋务”以来的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改造的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特别是使乡村和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要觉悟到乡村,有了这一步,才可以觉悟到一切。所以,乡村建设应该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把破坏农村的力量分为:①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②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破坏乡村的助手;③文化属性的破坏力——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所带来的种种破坏力。从时间上来说,近百年前半期是走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农村;后半期是走反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方破坏了中国乡村。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旧社会结构的崩溃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失败。

梁漱溟认为,中国建设不能像日本那样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他认为,技术进步、

产业开发不出两条路向，一是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路向，近代西洋社会即走此路，而为日本模仿成功，这条路中国已不能走。另一路向是社会本位统治计划的路向，即苏联之路。他认为苏联的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更高，必须有一强有力的政府，而中国社会又不允许有这样的政治。因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是乡村建设，他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路子。他说：“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绝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

为此，在国民党地方派力量的支持下，梁漱溟及其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杰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梁漱溟以外，还要提到晏阳初。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在他主持和带动下，1926年，一批有志之士及其家属跟随他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